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

——兼论王明珂、张兆和对“汉”的理解
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1-0016-06

●王红艳

[摘要] 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族是融合了若干少数族群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达是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以来作为中华民族众多民族或族群之一的汉族更趋向于成为与其他少数族群并列的、单一的族群。王明珂关于历史上少数族群通过攀附汉以实现身份认同的论述与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拒绝汉族身份而宣称苗族身份的认同的论述均显示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忽视二者的差异是后来学者对许烺光“民族错失”误读的原因。

[关键词] 华夏之汉;族群之汉;民族错失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实行民族识别政策以来,中华民族被表述为由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在此大家庭中,汉族和非汉少数民族并列,中华民族是一体,不同民族(或族群)是多元。然而,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更多是以汉族为表述而存在,一体即主要以“汉”为表达的一体,多元则主要是“汉”中所包含的多因素群体。民族识别之前的“汉”指向多元融合体,可将之视为华夏一体的华夏之汉;民族识别之后的“汉”指向单一族群,可将之视为族群之汉。那么,历史上华夏之汉怎样形成,其边缘如何扩大,即不同群体如何融入到汉中,进而形成包含多元因素的汉,这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近代以来汉的边界又是怎样收缩,原包含多因素的华夏之汉是怎样演变为单一族群的汉族,这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忽视“汉”概念的

* 本文写作灵感源于 2010 年 8 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举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研究生论坛中关于民族走廊研究的系列讲座。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1 年第 1 期(总第 68 期)

2011.No.1(Total No.68)



变化将会在中国族群研究中产生怎样的后果,同样也是引人思考的问题。

一、王明珂与张兆和对“汉”的理解

在探讨历史上汉族的形成、不同群体如何融入华夏文明时,王明珂的一系列研究^①具有重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一文。尽管《论攀附》主要探讨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历史基础,但该文详尽论述了华夏之汉多元一体的形成机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华夏汉族多元融合的形成历程。在《论攀附》中,王明珂认为,近代以来以黄帝或炎帝为共同祖源想象的中国国族建构是一沿续性历史过程的最新阶段。在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从一混沌初成的族体逐渐在政治地理边缘方面以及社会边缘方面扩张,华夏边缘的扩大也是历史上非汉群体不断融入汉中并形成汉族的过程。王明珂论述中的华夏之汉不仅包括当代的汉族,还包括原为华夏政治边缘、被视为蛮夷的非汉群体以及中国境内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他认为,历史上处于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以及处于华夏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通过得姓、祖源记忆攀附黄帝或炎帝以达到身份认同,将自身融入到华夏范围之内,从而不断扩大汉的范围。

通过王明珂的分析,可以看到,历史上作为华夏之“汉”的汉至少由三部分群体构成:一,华夏核心群体,即居于中国域内中心位置的中原统治上层;二,居于华夏政治边缘、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三,居于中国域内华夏社会边缘的底层乡野群体。王明珂把第二与第三部分群体,即少数民族与乡野群体统称为华夏边缘群体。他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的扩张机制源于边缘群体对中央华夏的攀附,也就是说边缘群体透过构建与黄帝或炎帝的血缘联系或祖源记忆,同时对周边其他群体贬低,使自身融入到华夏群体的身份认同中,进而将自己融入华夏群体。而且,攀附历程至少从战国时起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这一历史过程王明珂称之为边缘群体对华夏的攀附过程,费孝通称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②这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实行民族识别政策之前汉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这里的“汉”可视为华夏之汉。华夏之汉的形成如费孝通所指出:“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③因此,历史上的“汉”是一个包容多元群体、边界开放的汉族。

而且,华夏之汉不仅是多元的表述,也是一体的表述。王明珂所论述的华夏之汉形成的历史语境是历史上族群意识不太强烈,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前的历史语境,在此历史语境中,“汉”是中央文明的表述,融入到“汉”的集团中就等于融入到华夏文明或帝国范围之内。历史上被视为蛮夷的群体或被视为乡野的群体更多指向的是“文明”与否,而非群体身份上的区分,因此,边缘族群可以通过宣称自己与黄帝、炎帝或象征文明的祖源的联系改

① 关于华夏边缘的研究,本文主要参考了王明珂的两本著作和一篇论文,分别为《羌在汉藏之间》、《华夏边缘》、《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

②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变蛮夷或乡野的身份,从而晋升到华夏文明群体之列,也会出现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贬低对方为蛮子的现象。因此,融入“汉”或认同“汉”的身份更多是对帝国或中央的认同,是对华夏一体的认同。

不难看出,在王明珂的研究中,“汉”具有与华夏重叠之处,即“汉”更多指向多元的一体,这个一体中融合了当代的汉族以及民族识别之前的非汉群体,这里的“汉”与当前的中华民族有更多相通之处。通过对“汉”的攀附融入到汉中进而达到对当时一体的认可,汉本身即是一体,是一体的表达,少数族群认同“汉”是对一体的认同。

因此,华夏之汉是多元的融合体,更是一体的表达,历史上不同族群对“汉”的认同更多地指向对华夏一体的认同。近代以来,尤其上世纪 50 年代后,国内少数族群经历了民族识别过程,在此过程中,原先被视为汉边缘的蛮夷群体重新界定自身,非汉群体多以少数民族身份成为与汉族并列的中华民族一体之内的族群。经过民族识别,“汉”的包容性收缩,由原先包含多元的一体逐渐转变为单一的族群,“汉”作为一体的表达逐渐被中华民族一体的表达所取代。“汉”向单一族群转变、其他少数族群对自身身份重新界定以及不同少数族群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形成三个相关的过程,这是张兆和族群身份研究的历史语境,张兆和提出的挪用策略正是非汉族群标志自身族群身份的一个策略。

在《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①中,张兆和论证了近代以来苗族如何通过挪用他者意象标志,维系自身身份认同。文中,作者分别从历史上苗族千年教起义传统,民国时期苗族土著精英要求国家承认苗族为中华国族国家体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1949 年后土著知识分子书写官方苗族历史以适应民族政策以及“革家”土著群体抗拒苗族身份而寻求国家承认他们为所自称的单一民族类别四方面,论证了苗族土著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历程。非汉群体透过他者意象的转换、挪用和驯化来创造和维系自我的群体主体身份,挪用策略即是当地群体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机制。张兆和认为,在历史上,中央统治集团形成了丰富的以苗族为他者的概念想象,苗族群体正是通过挪用他者想象创建和维持作为族群主体的身份认同。他列举了历史上苗族通过挪用、转化华夏帝国对苗族妖魔化的身份起义,民国时期以及 1949 年后苗族土著精英挪用汉人对周边群体的他者意象和建构汉人作为他者概念来实现身份认同。

张兆和没有说明历史上“汉”如何转变为当前的汉族,但当地土著族群通过挪用他者意象建构自身身份认同,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原“汉”边界收缩,“汉”由华夏一体向族群转变,“汉”的一体表述向中华民族一体表述转变的过程,如他所述的民国时苗族精英梁聚五等要求国家承认苗族独立的少数民族身份。梁聚五要求承认苗族是少数民族有一个前提,即他首先承认苗族族群本身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认同中华民族的框架之内进行身份认同。除千年教之外,苗族群体在抗拒汉族身份认同的同时,积极将自身融入中华民族的一体中,在认同中华民族前提下标志自身身份认同。这与历史上非汉群体攀附“汉”有着相通之处。在历史上“汉”是一体的表达,而近代以来,一体由“汉”逐渐转变为中华民族,“它(中华民族)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②民族本身的层级性逐渐凸显。

① 张兆和.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J].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研究生论坛之“多学科视野下的民族走廊”,2010,(8).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因此,张兆和所论述的“汉”不仅指向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族群意识逐渐强化背景下在中华民族范围内与满、蒙、回、藏等相并列的汉族,而且更多指向在上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后与识别出的其他少数民族群相并列、中华民族之内众多族群之一的汉族。

对当前中华民族作认同,同时对当前自身族属作认同进而融入中华民族一体中,这是当前非汉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共性。伴随此过程,原先的“汉”转化成一体中的单一族群。张兆和在对西南苗族身份认同研究中看到,汉族从融合了多元因素的一体逐步走向包容性降低、边界清晰的族群之一。因此,张兆和在论述苗族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揭示出了汉族边界收缩的过程。在张兆和研究中,“汉”的边界在缩小,作为族群呈现,挪用策略正是“汉”边界收缩的机制之一。而且,在张兆和的研究中,民族的层级性逐渐凸显,即中华民族是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体,在这之下,是各个不同族群的并列,即一体中多元的并列,“汉”是多元之一。在这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更高级的族群概念在民族识别政策中被建构出来,在中华民族一体中,各族群的差异性被凸显,汉族边界收缩,汉族中多元因素被分离。

由王明珂的研究到张兆和的研究,“汉”作为一个概念经历了如下变化:

“汉”作为华夏一体→“汉”作为单一的族群

“汉”的华夏一体→拥有众多族群的中华民族一体

因此,在近代尤其是民族识别之后,“汉”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成为高一层次的民族,是融合汉族与非汉少数民族群在内的多元因素的整体,华夏之汉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①原先的“汉”逐渐收缩成为中华民族族群内的汉族。

王明珂主要研究历史上族群边界变迁问题,以战国前为起点一直到近代为时段,论证了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夏外围的群体如何同化到一体中,并形成对一体的认同,王明珂关注的是华夏之汉边缘的扩大。与王明珂不同,张兆和主要研究现代族群边界的变迁问题,即研究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以及从民国到现在,汉外围群体如何从“汉”中分化出去,并形成对中华一体的认同,张兆和的研究显示了作为族群“汉”的边缘的收缩。^②对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恰好显示了历史上华夏之汉与近代以来族群之汉的差异。也就是说,王明珂对历史上“汉”的形成的分析以及张兆和关于近代以来苗族族群身份认同策略的研究,显示华夏之汉向族群之汉转变的历程,在此转变中,原有的“汉”发生变化。因此,对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汉”概念包容性的变化。忽视民族识别前后“汉”的差异,将民族识别后的族群观念套用于原有的族群现实,容易遮蔽现实世界中族群认同背后固有的含义,将许烺光《祖荫下》误读为“民族错失”便是其中一例。

二、“民族错失”:学界对许烺光的误读

在族群认同研究中,学界存在普遍趋向,将民族识别之后的族群身份认同套用于现实社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② 张兆和关于西南苗族身份认同的一系列研究均涉及近代以来汉边缘收缩的问题,本文主要参考其《在逃遁与攀附之间:中国西南苗族身份认同与他者政治》、《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会不同群体身份认同,这不免会导致对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同地域群体表述身份认同的误解。最著名的便是众多学者用民族识别后的白族身份认同评判许烺光对民国时西镇人的研究,并将许烺光没有指出西镇人为白族人误读为“民族错失”。^①

许烺光在《祖荫下》这部著作中,把西镇视为典型的汉族聚居区,把西镇人当作汉族人,进行研究。作者以云南大理西镇为田野点,试图用该地的家族文化解释西镇人个体性格的塑造过程,以此来揭示中国文化的共性。作者提出,由祖先庇护主导的“大家庭理想”,导致西镇穷家和富户子弟的“地位人格形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可以解释西镇人的种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也可以解释整个中国文化,甚至可以解释中国朝代兴衰。然而,自实行民族识别政策之后,西镇人主体与大理民家人一道被识别为白族,^②绝大多数关于西镇人的表述都将西镇视为一个有少量其他民族的白族村镇。因此,《祖荫下》“弄错了民族”便成为后人对此著作以及对许烺光的定论。人类学界如利奇、郝瑞(Stevan Harrell)、马克林(Colin Mackerras)都持此种观点,他们或认为许烺光的《祖荫下》抹杀了“民家”和“汉人”的区别,或认为许烺光上了西镇人的当,错误地将他们当成汉人。^③

之后,国内学者对《祖荫下》进行反思,国内学者没有直接认为许烺光的研究存在“民族错失”,而认为当前白族居民身份认同具有双重性。如段伟菊认为,“当地人认同上具有双重性,他们的认同存在着编撰家谱所呈现出的‘汉人族源认同’与强烈的‘白族认同’两个方面”,^④她把这种认同视为当地人身份认同上的“双重认同”。^⑤

庄孔韶也认为,在现实身份认同中,当地人确实存在族属与祖源的双重认同,他不仅认为西镇人具有双重认同,而且认为福建百崎郭姓宗族同样存在双重身份认同。福建百崎的郭姓宗族,在族源上认同古代名人郭子仪,而在族属上却认同回族。庄孔韶认为西镇人和百崎郭姓宗族存在双重认同是因为民族识别赋予他们的白族和回族族属得到他们的认同,在本质上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国家政治里呈现的角色与身份。他认为:“通过族源的认定,表现地方社会对国家政策的反向回应,这样的宗族内涵,体现了一方面认同汉文化的族源,一方面又处在背离主流的族群对话的地位上。”这种“理念先在是儒学礼制濡化的结果,是地方化对正统化的回应的不同方式的基础”。^⑥庄孔韶从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二者对话角度来解释双重身份认同,提出民族识别政策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不认为许烺光“弄错了”民族。

梁永佳则认为,民国时代的大理社会,“民家”和“汉人”的差别并不重要,两者也没有民族差别,当地没有双重身份认同。^⑦他从四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他认为,作为现实,民国时代

①对许烺光“民族错失”的了解,本文得益于梁永佳的《〈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一文,本文中“民族错失”资料部分源自梁永佳的分析。

②③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④⑤ 段伟菊:大树底下同乘凉 ——《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⑥ 庄孔韶.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⑦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的西镇人明确地将自己界定为汉人,《祖荫下》的论述符合这一实情,不存在“民族错失”。进而,他认为,有关《祖荫下》的“民族错失”的意见,其实质在于误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概念解释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从而忽视了民族识别对民族意识的强化,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某些分类,在民族识别之前和之后,可能存在相当不同的意义,用“民族”概念将民族识别前的社会现象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民族问题”或“族群认同”问题,容易遮蔽那些现象的固有含义。接着,他提出国家权力对于“民族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巨大作用。可以说,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概念时,不考虑当代民族—国家的在场是不合适的。最后,他总结国家权力对于“民族”和“族群”的关键意义,这已经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对于当代民族—国家尚处于雏形时期的民国时期来说,使用“民族”或者“族群”去理解尚未被国家权力认可为少数民族的大理人群,是一种将现象抽离出社会语境的做法。梁永佳指出了民族识别政策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他已经表达但没有展开论述的是民族识别前后“汉”概念的差别所导致的白族群体自身身份认同的变化。在民族识别之前,白族作为“汉”中的一个元素存在,所以当时西镇人在自我界定中,没有白族认同意识,而把自身认同为“汉”。这种认同一方面有对“汉”的认同,另一方面更多表达的是对中华帝国或华夏一体的认同,这种对“汉”的认同在家谱或口传中保留并流传下来。具有强烈祖先崇拜意识的西镇人,经历了民族识别之后,白族族属意识开始强化。现代西镇人不可能轻易改变祖源记忆,但同时现实中他们白族身份的出现又使得他们逐渐认可现实中白族的族属身份,以此与当前的汉族相区别。当然,他们在当前语境下,认同自身为白族人的同时也认同自身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群体。这种看似认同上的矛盾正是“汉”概念的收缩且同时也是华夏一体的“汉”向中华民族一体演变使然,是当地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所经历的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精确表达,真实反映了“汉”概念变迁的现实痕迹。

因此,西镇人的认同不全是双重认同,许烺光把西镇人作为汉人研究没有失当之处,不存在“民族错失”,存在错失的恰恰是后来的研究者。后人发生“民族错失”的原因在于对民族识别前的“汉”与民族识别后的汉族的混淆,正是后来研究者忽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差异,导致了对许烺光的误读。诚如梁永佳所指出,有关《祖荫下》的“民族错失”的意见,其实质在于误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概念解释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从而忽视了民族识别对民族意识的强化。^①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像民国或更早的大理“民家”这些当时被认定为包含在“汉”群体内的人群,他们认同的“汉”不仅仅是汉族,更是多元一体的华夏之“汉”,当时的“汉”不仅指向汉族,同时也包括王明珂所研究的华夏边缘群体。西镇人“汉”的祖源正是对这种华夏一体祖源的记忆,而当代白族人认同的白族族属是民族识别后与汉族相对的白族。当前白族人认同上的祖源与族属的双重性是“汉”边界的收缩所致,是历史上华夏之汉与当前族群之汉区别所致。

因此,忽视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是导致当前关于“民族错失”的争论的原因,透过类似争论,能够看到“汉”概念的差异所带来的研究中的误解。

[收稿日期]2010-12-12

[作者简介]王红艳(1978~),女,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呼和浩特 010073

^① 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9,(5).



马成俊 张海云·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 ——谨以此文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2.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发展了功能派文化理论;3.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探讨不同传统文化的人们如何形成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4.社区研究理论。纵观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和“志在富民”的人文关怀是他行万里路并著书立说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是他民族研究的理论基石和框架,细致的实地调查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包括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他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路之一,对甘青民族社会经济发 展的诸多设想、建议和思考是他对现实问题的总结、提升和理论升华。费孝通甘青民族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其理论框架和研究理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体认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仍具有现实意义,当前甘青民族地区的诸多建设规划都是在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和实施的。

[收稿日期]2010-10-13

[作者简介]马成俊,撒拉族,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西宁 810007

张海云,女,民族学博士,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西宁 810007

Fei Xiaotong's Investigations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Gan-Qing Ethnic Regions

Ma Chengjun Zhang Haiyun

Abstract: Since 1984, Fei Xiaotong had undertaken 12 visits to Gansu Province and 2 visits to Qinghai Province. The timely visits at the jun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areas, he was involved in deep thinking about finding out the 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societies in Western China. Through field study in minorities' area in Gan-Qing, he conceptualized various development patterns for Gan-Qing area which differs from Sunan, Wenzhou, Zhujiang and other inland ones.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bas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at Fei used to investigate Gan-Qing minorities' areas to show his line of thought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Key words: Fei Xiaotong; Gan-Qing minorities' area; investigation; conceptualizati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axia Han and Ethnic Han: Concurrently on Wang Mingke and Zhang Zhaohe's Ideas of Han and the Reason that the Academia Misunderstood Xu Langguang

Wang Hongyan

Abstract: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Hans were a unit which was integrated from several minorities, this very unit was called Huaxia Han. Sinc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was introduced, the Hans had become a separate ethnic group coexisting with other minorit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axia Han and Ethnic Han was demonstrated by the fact of minorities' identification with Han via attaching themselves with the latter in history, as was already pointed out by Wang Mingke, and Miao's refusal of Han identity in modern times, as mentioned by Zhang Zhaohe. Ignoring this difference is the reason that caused later scholar's misunderstanding of Xu Langguang.

Key words: Huaxia Han; Ethnic Han; misunderstand (See P.16)